

张伯行书院教育实践及其理学思想的传播

——以苏州紫阳书院为中心

王卫平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张伯行是清代前期著名官员和理学家,为官期间,重视文教,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先后创建多所书院,为清代书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本人也成为著名的书院教育家。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创建苏州紫阳书院,后来成为江南地区的著名学府。张伯行将其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相结合,对紫阳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读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不仅推动了紫阳书院的发展,而且对清初学风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张伯行;书院教育;理学;苏州紫阳书院;清初学风

中图分类号:K203 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5-0219-05

张伯行是清代前期著名官员和理学家,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律、严厉惩贪、治理黄淮、赈济灾荒、兴利除弊、兴学重教,政绩卓著,不仅赢得了民众的爱戴,更被康熙帝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但多集中在其为官清廉、嫉贪如仇等方面,有关张伯行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较少,至于研究其与书院教育关系的论著更为寥寥。实际上,张伯行历官所至,重视文教,以兴学育才为己任,不仅是著名的官员和理学家,还是著名的书院教育家。他任职山东、福建、江苏时建有多所书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康熙四十六年任福建巡抚时创建的鳌峰书院和康熙五十三年任江苏巡抚时创建的苏州紫阳书院。这两所书院分别发展成为清代福建、江苏两省的最高学府,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推动了两地学术的振兴和发展,在书院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张伯行创建苏州紫阳书院情况的探讨,考察其书院教育实践,梳理其理学思想对苏州紫阳书院产生的影响,借以窥见苏州书院与清初学风变迁的关联。

一、“天下清官第一”:张伯行简介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

收稿日期:2008-04-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清代吴地书院教育与吴文化发展”成果之一(06JSDLS001)

作者简介:王卫平(1962-),男,江苏溧阳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与明清史研究。

南仪封人,故称仪封先生。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后归乡闭门读书七年才出仕。康熙三十一年考授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十七《张公伯行》),历任济宁佾事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顺乡试正考官、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等职,雍正元年(1723)官至礼部尚书,雍正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清恪”(《清史稿》卷二六五《张伯行传》)。著作宏富,汇为《正谊堂文集》等。

张伯行居官最大的特点是清正廉洁,惠爱百姓。他认为“官无大小,在得民心”(陈康祺:《郎潜四笔》卷十二)。为官二十余年,忠于职守、精心筹划、治理黄淮、赈饥济贫、兴利除弊;正直不阿、廉洁自律、一芥不取、自甘清苦;不畏权贵、严厉惩贪;兴学重教,力倡儒学,政绩卓著,而尤以在福建、江苏为著。其在江苏巡抚任上发布的《禁止馈献谕江苏等七府一州示》中说:“一珠一黍,尽属民间膏脂,亦思宽一分受一分之赐,期于自尽吾心,若思爱一文即受一分之污,何以无惭矜形。”(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五《禁止馈献谕江苏等七府一州示》)其勤政利民的高风亮节不仅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感念,以至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负皆知称公”(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卷首《任兰枝序》)。更深得康熙帝的宠信,被康熙帝誉为“操守清洁,立志不移”、“天下清官第一”(《清朝列传》卷十二《张伯行传》),成为封建官吏的楷模。其“学业彪炳于寰区,政事懋昭乎国史,古人所称‘三不朽’盖兼备焉”(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卷末《程正家后注》)。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提及张伯行时说:读张伯行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令人神往。”^[1]

二、“讲道课文，兴起甚众”：张伯行书院教育实践

张伯行不仅是“天下第一清官”，还是清朝前期著名的理学家，其为学宗尚朱子，力主程朱理学，以躬行实践为己任（沈起元：《敬亭文稿》卷九《座主张清恪公文集序》），与陆陇其、李光地等理学大师齐名。张伯行注重理学的宣扬和传播，其治民坚持“以养为先，以教为本”。（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名臣·张清恪公事略》）为官期间，以兴学育才为己任，重视文教，在许多州县修建学校、义塾，培养人才。且以理学化导士子，大倡儒学，成就瞩目^[2]。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所至辄建书院，招来士子之有学者，相与讲明圣贤之道”^[3]，先后在河南、山东、福建、江苏修建多所书院。他不仅亲自为书院挑选学术醇正、操守清廉之著名学者担任山长，还手定学规，使书院形成完备的教育教学制度，并拿出自己家藏书籍，搜求前贤遗书，在书院开展大规模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张伯行在书院教育方面躬行实践，为清代书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清代著名的书院教育家。

张伯行故籍仪封旧有饮泉书院，曾经颇为红火，吸引了众多学徒。张伯行8岁时，偶至其处，见书院虽存，但生徒四散，一片衰败之状。张伯行知其为讲论地后，慨然曰：“吾他日必读书于此。”（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顺治十五年戊戌，8岁条）张伯行与书院最早即结缘于此。

康熙三十三年（1694），张伯行“丁父忧归”。在家为父守丧时，即在饮泉书院旧址西侧置田20亩建请见书院（《清史稿》卷二六五《张伯行传》），得到县令支持。次年二月，书院建成。他请当时河南著名的教育家冉觐祖担任书院主讲，自己也经常至书院“与中人士讲明正学”（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名臣·张清恪公事略》）。

张伯行任职山东期间，继续以发展书院教育为己任，主动捐俸先后建清源书院、夏镇书院，并捐资修复济阳书院。公务之暇，经常到清源书院“与诸生讲道论文，造就甚重”。张伯行升任离去时，仍留银二百两为书院置田，以为永久之计。并致书东昌知府，令其管理书院，不至荒废。夏镇书院建成后，张伯行请本地秦某主教，并“檄二省士子读书其中，一时人文蔚起”。张伯行在济阳书院“集士子讲道课文，兴起甚众”（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康熙四十三年甲申，54岁条）。可见张伯行始终把教养人才、振兴正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康熙皇帝亲自举荐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张伯行到福建后，一如既往，坚持书院教育实践，“三月升福建巡抚，六月抵福建巡抚任，冬十月建鳌峰书院”，《张清恪公年谱》中详细记载了张伯行创建鳌峰书院的经过。

书院前建正谊堂，尊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夫子，后为藏书楼，购经、史、子、集数万卷存放于内。书院“广收九郡一州才品行谊之士”，日给伙食补贴，岁供衣

服，并给往来路费，使他们安心学习，“一时有志之士，慕道借来几数百人”（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康熙四十六年丁亥，57岁条），杰出者如蔡世远、蓝鼎元、黎致远、余祖训等。张伯行聘罗源县蔡璧（蔡世远之父）主书院事，讲授先儒为学之旨及修己治人等知识。他还直接参与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公余之暇，辄为学者指道统之源流，示人圣之门路”。他收集先儒名言，借鉴其他著名书院的学规，刻成《学规类编》、《养正类编》，作为书院生徒遵循的依据；制定《丽泽堂学约》、《张仪封教人读书日程》（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康熙四十六年丁亥，57岁条），对学生读书学习的方法作出详细的规定。为了开展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鳌峰书院大量购进书籍资料，并进行大规模的校书、刻书活动。张伯行“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为《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清史稿》卷二六五《张伯行传》）。由上可知，张伯行建鳌峰书院是出于传播理学、振兴理学的目的，这在他撰写的《鳌峰书院记》中也有清楚的表述，所谓“讲明濂洛闽关之学，以羽翼经传”（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鳌峰书院记》）。

“公遵程朱之正矩，一阵海滨邹鲁之遗风”（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卷首《雷序》）。在张伯行的努力下，鳌峰书院形成了完备的教育教学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费元衡《张伯行行状》称鳌峰书院“成就人才甚众”；潘思榘在所撰《鳌峰书院序》中说：“岭海知名者，类出其中焉”（张伯行：《正谊堂全书·福建通志》），如林则徐、梁章钜、陈化成、蔡世远、雷翠庭、陈寿祺等人均出于此。鳌峰书院久享“文蔚”的美誉，发展成为清代福建省的最高学府。为纪念张伯行，“闽士肖公像，祀于鳌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名臣·张清恪公事略》）。

当时台湾各府无书院，而道府厅县历任各官，俱各立一生祠。当张伯行了解到这一情况时，当即饬令各衙门，将道府等官所有生祠一律改为紫阳书院，以崇祀先贤，振兴文教^[4]。

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张伯行移抚江苏，三月至锡，首先修复著名的东林书院，并招“耆儒高愈、钱仲选、顾培、顾麐等讲学其中，阖邑人士多所兴起”（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康熙四十九年庚寅，60岁条）“公躬诣讲学，与诸生反复讨论朱陆异同，言厉而色和，学者有典型复见之叹。”^[5] 54后无锡绅士为感激张伯行在东林书院讲学，并“敦请师儒，作养后哲，一时人文振起，遗泽常新”的贡献，奉公粟主，崇祀道南祠。（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雍正三年乙巳，75岁条）

清初，苏州地区原有书院多残破堙废，士子读书无所。随着经济的复兴和文化的发展，“来学者众”。面对这种情况，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张伯行乃于府学东建紫阳书院。次年三月书院落成，“三吴文学之士，皆倾心诚服于先生，而四方之闻风来者日众”。张伯行在紫阳书院全面传播、讲授、研究朱子义理之学，“一时士风丕变，咸敛华就实，彬彬乎质有其文焉。”^[3] 紫阳书院发展成为苏州

地区的最高学府,历任掌院者皆为硕学鸿儒、著名学者,如陈祖范、王峻、沈德潜、廖鸿章、彭启丰、蒋元益、钱大昕、石韞玉、朱珪、俞樾等人。直至1904年书院改为江苏师范学堂(曹允源:《吴县志》卷二十五《书院》),紫阳书院先后经历约190余年的历史,在吴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纪念张伯行,“吴人建春风亭于公祠,与于清端、汤文正两祠并峙。”(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名臣·张清恪公事略》)

张伯行作为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员和理学家,历官所至,“必兴书院,聚秀民以学朱子之学”^[5]⁵⁵。对于修建书院,始终寄以极大的热情。终其一生,先后在河南、山东、福建、江苏等地创建、修复了众多书院,并创建了两所著名的省级书院——福建鳌峰书院和苏州紫阳书院,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伯行在书院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书院教育的发展。

三、学宗程朱,道化紫阳:张伯行与苏州紫阳书院

清初,王学衰微,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清统治者定鼎北京以后,制定“表章经学,尊重儒先”的文化政策,顺治十年,更将“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6]。康熙统治时期,加意提倡程朱理学,谓:“人主临御天下,建极殄馘,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康熙十七年一月乙未)基于此,他下诏以婺源朱熹十六代孙朱坤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籍奉祀,以示尊崇程朱理学。此后,康熙崇奖程朱理学之举益多。康熙四十年,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主持纂修事宜,并亲自为之作序^[7],以示对朱熹的推崇。康熙五十一年,又明确指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并颁谕将朱子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一。康熙五十二年,《御纂朱子全书》告成并于次年颁行,理学之政治地位愈益巩固。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正统,并被积极贯彻于书院教育中,对书院教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清初各地书院犹尚讲学,如“二曲之于关中,习斋之于漳南,张、蔡之与鳌峰”^[8]。鉴于明末东林等书院讥议朝政、裁量人物的教训,出于政治的考虑,清初采取限制书院发展的政策,如顺治九年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古今图书集成》卷十七《选举典·学校部》),并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和管理,以程朱理学作为讲学的主要内容,书院讲会制度逐渐消失。

康熙中叶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得以确立,作为各级地方学校的必要补充,书院教育日渐兴起。不少讲求理学的书院相继得到修复,如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高阳书院、浙江敷文书院、河北莲池书院等,“不

惟作育人才,振兴文教,而且每系一方学术兴废”^[9],影响较大。康熙帝对此类书院褒奖有加,屡屡颁赐经费匾额,足见清廷尊崇程朱理学之苦心。^①在此背景下,康熙五十二年,江苏巡抚张伯行建紫阳书院于苏州。

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张伯行奉旨谕允,于苏州府学东尊经阁后建紫阳书院,“首捐清俸,和诸绅士之踊跃乐输者凡若干缗,为之营立膳田,拓基址,增田舍,使夫士之于自然鼓篋而来者风雨有庇,扉屨有资,庖湫有所”。翌年三月,书院建成,“规模煊然大备”^[10]³³³。紫阳书院以鳌峰书院为蓝本,“其规模制度及讲贯课试之法,大略与闽同”^[11]。其规制:“前堂设朱子神位,中建讲堂,后建大楼,两旁建书舍”(张师杖:《张清恪公年谱》,康熙五十三年甲午,64岁条)。张伯行在《紫阳书院碑记》中记道:“地处于学宫之旁,材取予僧庐之毁,工成于农隙之余,中为崇祀紫阳朱子之堂,旁为诸生讲学、藏修之舍,庖廩浴靡不必具。经始于癸巳之冬,落成与甲午之春”。张伯行宗程朱之学,“最服膺朱子”,因朱熹号紫阳,故“署额紫阳”(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书院建成后,张伯行“择所属高材诸生肄业其中”(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五《书院》),聘“崇明县教谕郭正宗、吴江县教谕夏生董其事”,“三吴文学之士皆倾心诚服于先生,而四方之闻风来学者亦日众”^[3]。一时士子为之鼓舞,“风气既张,不独江南士子,即浙江、福建、江西、山东等地学人,亦多有负笈而来者”(张师杖:《张清恪公年谱》,康熙五十三年甲午,64岁条)。张伯行亲笔撰写了《紫阳书院碑记》《紫阳书院落告朱夫子文》《紫阳书院示诸生》《紫阳书院读书日程》四篇重要文章,将其理学思想贯穿其中,不仅用以作育生徒,更传播了他的理学思想。

张伯行具有朝廷命官和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他建书院尊奉程朱理学,既有执行朝廷旨意敷教化之目的,但更大程度上,又是其个人学术取向的体现。张伯行将紫阳书院作为其理学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以程朱理学教导士子,将其理学思想充分运用到书院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对紫阳书院产生了重要影响。

紫阳书院建成后,张伯行为文以志缘起,在《紫阳书院碑记》中阐述了他创建紫阳书院的原因:“东南文学之盛,自言氏受业于圣门,得其精华而归而教其乡,厥后英才蔚起,代有其人,故声名人物甲于海内,流风至今不坠。”(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恭逢天子重道崇儒,崇尚实学,升朱子于十哲之列,复颁《朱子全集》刊布学宫,“诸生得以时肄业,兴起教化,诚盛举也”。(张伯行:

① 如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各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发日讲解义经史诸书;三十年,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于苏州紫阳书院;四十四年,御书“正谊明道”匾额悬董仲舒祠,“经述造士”匾额悬胡安国书院等(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八》)。

《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不佞中州鄙人, 谬膺简命, 抚临兹土, 数载于兹, 顾不能宣扬上德于万一, 不有忝斯任乎? 窃念服膺于朱子之教有年, 稍能窥学问之大概。……不佞乐与多士恪尊圣教, 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张伯行认为“为政莫急于贤才, 致治必先乎教化”(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 明确指出创建紫阳书院的用意, 乃在明“学者之所以为学, 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非徒以为工文辞, 取科第之资而已也。诸士子勉旃勿务华而离其实, 亦勿求精而入于虚。他日学成名立, 出而大有为于天下, 庶无负不佞养贤报国之心”。希望诸生“濬经史之精英, 为太平之黼黻, 发程朱之密钥, 成一代之硕儒”(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 对书院生徒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期待着“三吴士子来肄业者, 皆恂恂执玉之容; 四海儒生愿追随者, 凛抑抑循墙之诚。庶乎道明德立, 操修罔见晨昏, 致知力行, 践履无虚岁月。自是居仁由义, 于以见斯道之大行, 从兹希圣希贤, 方不失吾儒之正脉”(张伯行:《正谊堂文集·续集》卷八《紫阳书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能够光大儒学。

张伯行笃信程朱理学, 并以之作为自己研究学问和为政的指导思想, 竭力鼓吹, 身体力行, “以明道觉世为己任, 直接紫阳朱子之传”^[5]⁵³。高斌在《正谊堂文集》序中称其自幼即“志于圣学, 积有年所……生平笃信朱子, 表彰不遗余力, 大要尤谓居敬以立其本, 穷理以致其知, 躬行以践其实, 紫阳一脉所以直接尼山者在是”。徐世昌谓其“学宗程朱, 不参异说, 奉‘主敬以端其本, 穷理以致其志, 躬行以践其实’三言为准的, 以圣人之道为必可学, 而不可一蹴就几, 循序渐进……检束考验, 至老不懈。诚敬上结主知, 立朝靖献, 一本所学, 为理学名臣之冠。”(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十二《敬庵学案》)

张伯行是一位纯正的理学家, 他把儒家各代所学和主张概括成一“敬”字, 他说:“千圣之学, 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 学莫先于主敬。”(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二《张孝先先生》)因此学习儒家思想, 应当把“主敬”放在首要地位。他“于正学奋志修明, 而于陆、王之学复排击不遗余力”^[3], 甚至奋声疾呼:“陆王之学不熄, 程朱之学不明!”(张师栻:《张清恪公年谱》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63岁条)为此, 张伯行规定以“正学”即程朱理学作为紫阳书院的教学内容, 借助于诠释康熙帝的旨意, 更把朱子推为学术至尊。他说:“朱子之道迭明迭晦于五百年间, 迄未有定论。惟我皇上‘学术渊源, 躬行心得, 默契虞廷’十二字真传, 独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 穷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践其实, 其道大中至正而无所于偏, 纯粹以精而无所于杂。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 其论遂归于—。”紫阳书院“当以紫阳为宗, 而俗学异学不得而参焉者矣”(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可以看出, 张伯行以《朱子全书》作为紫阳书院的基

本教材, 以朱子理学作为书院教学的基础内容。与当时大多数书院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内容相比, 紫阳书院确乎是别树一帜的。

为表彰程朱理学, 张伯行还广搜先儒文集遗书, 陆续纂辑刊刻, 广为传播。他先后纂辑《学规类编》、《养正类编》、《小学衍义》、《濂洛关闽集解》、《近思录集解》、《伊洛渊源录》、《道学源委》、《性理正宗》等数十种理学著作, 配合书院教学。他还把历代数十家文集汇刊为《历朝文集》, 分为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四部, 形成煌煌巨编, 均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宗。张伯行如此殚精竭虑地表彰程朱理学, “显然并不单纯是因为朝廷的崇尚, 而是有着个人执著的学术追求作为支撑”^[11]。

张伯行非常重视书院的教学方法, 他说:“近日士尚浮华, 人鲜实学, 朝夕揣摩, 不过为猎取科名计, 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 茫乎概未有得, 岂士风之不古欤, 抑所以教导者之不得其方也?”(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

在紫阳书院的具体教学实践中, 张伯行并没有把“朱子之学”教条化, 因而与课习举业的普通理学书院有所区别。书院建成后, 张伯行取法宋儒胡瑗以经义、治事二斋为教之意, 为书院订立学规。朱熹为白鹿洞书院订立的学规, 为南宋至明清的大多数书院和官学所共同遵循, 使儒学教育又得以引导士人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的价值^[12]。张伯行特意写《紫阳书院示诸生》一文, 把朱子的《白鹿洞规》放在首位, 即五教、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八《学规类纂》), 主要规则有八条, 从各个方面对学生加以检束, 其大意谓:士子当致力于《四书》、《五经》, 以体悟内圣外王之道;明道统以程朱理学为归, 而辟陆王心学之弊;互相讲论, 虚心质证, 以免独学无友之隘;深究用世之道, 淹贯博通, 以裨实用;讲明心得, 羽翼经传;勤作札记, 以资省览;专心读书, 勿耽游乐;励志立品, 严加检束(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内容除惯常研习的四书五经、先儒论著、训练时文讲义、规范品行诸项之外, 还特意列出“学者所宜深究”的“用事之道”。他指出:“今之学者, 时艺之外, 茫然无知。傲倖一第, 出宰民社, 凡兵刑、钱谷、农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务可修可举者, 毫无定见, 不得不听命于奸胥猾吏。”因此要求“今诸生未第时, 乘此余闲, 即当留心世务, 淹贯博通, 务在有裨实用, 可以坐言起行”(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又说:“道在人伦日用之间, 体之心, 践之以身, 蕴之为德性, 发之为事业, 非徒以为工文辞取科第之资已也。”(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这些偏重于实学的主张, 既有清初经世思潮的背景, 也是张伯行多年为官之心得。

关于读书方法, 在张伯行看来, “人生一日不读书, 与读书而无法程, 虽勤惰不同, 其为失则均也……夫夜以继日者, 周公之勤也;不寝忘食者, 尼父之敏也;分治事与穷经者, 苏湖之教也。诗书濯其灵腑, 史籍长其精神, 文章抒

其见识,又学者无穷之乐也。慵废荒经,不学墙面,玩愒既久,岁月坐消,纵桑榆思奋,而羲御已驰。匪惟余身之是忧,亦二三子之所羞也。”(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张伯行读书自少至老,不厌不倦,虽鞍马舟车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尝释卷,尝云:“延平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朱子后来颇不以为然。盖佛家静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静坐,此心原要用,必静坐始见得道理,与佛家有别。但静坐而不读书,亦不能见道理。不如易静坐为‘居敬’,而勤读书以求道理,乃为无弊。且子夏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存心之法,即在于读书,何可懈也!”^[3]为此,张伯行为书院生徒写《紫阳书院读书日程》,与诸生约:“每日功课大略有四,悉书于策,泊乎浹月将考,厥成焉。”从经书发明、读史论断、古今文、杂著四个方面,予以详悉阐发,作为书院生徒读书治学的规范。张伯行还细致地规定了日程格式,如每日看某经、某史,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必身体力行。凡有所得,即记于是日课程之内;有所发明论断,悉书于后;每日所作古文时文,具备记之,以后时日以此类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由此可以看出,他教导学生颇为尽心。从内容上看,虽然细碎,但对于生徒的读书学习,却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此,杭世骏曾有“讲贵课士之法,略与闽同,士风丕变,敛华就实”之评(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礼部尚书张公伯行传》),洵为知言。

张伯行从紫阳书院的创办原因、创办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读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做了详尽的阐述和明确、细致的规定,其理学思想充分贯穿其中,不仅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初,苏州地区书院不常设,张伯行建紫阳书院,是“公之不动声色而奠吴民于枕席者,为福甚大”。“三吴文学之士,皆倾心诚服于先生,而四方之闻风来学者亦日众。一时士风丕变,咸敛华就实,彬彬乎质有其文焉。”^[3]从而出现了“彬彬彧彧,教化翔洽,上自胶庠,下逮编氓,莫不皆然”的盛况。为表彰张伯行创建紫阳书院、弘扬理学的功绩,康熙帝御书“学道还淳”额赐紫阳书院(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五《书院》),这对于紫阳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张伯行在紫阳书院建成后一年即离开了江苏,此后鄂尔泰于雍正元年(1723)任江苏布政使时,对紫阳书院重加整葺,论经史,谈经济,以培养人才(乾隆《江南通志》卷九十字《校志》)紫阳书院迅速发展,成为清代苏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13],在吴地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朝初年,程朱理学的官方正统地位得以确立,除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外,与清初以张伯行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理学大师借助书院为宣传阵地、振兴文教、竭力宣传理学、开展文化建设也是分不开的。张伯行作为清朝初期的理学大师和著名官员,努力推动理学书院

的兴盛,培育大批理学人才,促进学术繁荣,由此奠定了其在理学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后人盛称:“自朱子以来,大儒间出,其传未尝灭熄;而见道之确、行道之果、传道之广、卫道之严,未有如先生者。若元、明之许、薛、胡、罗、本朝之陆稼书,其学之中正相同,而论功,则先生驾而上之已。”^[3]

乾隆以降,在官学化的背景下,理学书院日益与考课式书院合流,沦为课试时文帖括的科举附庸。而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由于固守门户,内容教条僵化,也渐为士人所厌弃,程朱理学逐渐淡出土人的学术视野。从乾隆朝开始,乾嘉汉学逐渐兴起。但是,诚如陈祖武先生所认为:“清初学术是由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清初学者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倡导,实事求是的为学风尚的示范,诸多学术门径的开启,都为乾嘉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4]

参考文献:

- [1] 孟森. 明清史讲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74.
- [2] 李春光. 一代廉吏张伯行述评[J].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 [3] 费元衡. 诰授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二级赠太子太保谥清恪敬庵张先生行状[G]//钱仪吉. 碑传集: 卷十七.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4] 张天周. 张伯行的学术事功述论[J]. 史学月刊, 1985(4).
- [5] 杨静如. 紫阳书院志[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6.
- [6] 林国标. 清初理学的重建及其意义[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 [7] 李国钧, 王炳照.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5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17.
- [8]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下册[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6: 734-735.
- [9] 林存阳. 苏州紫阳书院与清代学术变迁——以钱大昕为研究视角[J]. 中国史研究, 2005(4).
- [10] 彭定求. 大中丞仪封张公书院碑记[G]//王国平, 唐力行.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 [11] 刘玉才. 论清初书院的理学与教化[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7(4).
- [12] 丁刚, 刘琪. 书院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13] 柳诒徵. 江苏书院志初稿[J]. 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 1931(4).
- [14] 陈祖武. 论清初学术的历史地位[J]. 清史研究, 1991(1).

[责任编辑: 那晓波]